

# 性與政治

論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黃克武

張賢亮是當代中國大陸一位傑出的小說家，最近他的小說《肖爾布拉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下簡稱《男》書）等書在台灣出版，立刻轟動一時成為暢銷書。張賢亮的魔力在於他曾經歷勞改營的痛苦生活，這種歷練使他的文字帶有一股強勁的生命力，再加上細膩而唯美的筆調，讀來令人盪氣迴腸。《男》書的含意非常豐富，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解讀，對於史學工作者而言，作者特別感受到其中所反映出的時代訊息，進一步來說，我覺得該書環繞著「性」與「政治」二個交織在一起的主旋律，反映出文革前後中國大陸人民（尤其是居於社會最底層的一般老百姓）內心最深沉的感觸。該書不但「通過飲食男女，表現了我們這個民族靈魂深處的溫順、達觀和樂天知命的宿命觀」（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民生報第九版，輔大林明德先生書評）；同時我覺得它更企圖批判這種溫順得可怕的民族靈魂。

《男》書的時間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前後，地點為河套地區的農村；故事的主軸是一個沒有女人的男人章永璘，和一個沒有男人的女人黃香久之間的「愛情」故事。章是「臭老九」與「反革命分子」，黃則為「勞改釋放犯」。兩人初次在蘆葦叢中偶遇，當時黃女正在裸浴

，彼此發現之後默默相視，似乎二人都期待發生另一件事情，作者寫道：

她的饑渴也是我的饑渴；她是我的一面鏡子。我心中湧起了一陣溫柔的憐憫，想佔有她的情欲滲進了企圖保護她的男性的激情。她那毫不準備防禦的姿勢，使我的心似乎收縮了起來；生理上的要求不知怎麼消失了，替代它的是精神上的憂傷。

然後章拔腿跑掉了。八年之後二人再度相逢而結婚，婚後章永璘在性生活方面無法滿足妻子的需求，而造成黃香久紅杏出牆，與共產黨員曹書記有染。後來章雖然由「半個男人」變成「一個男人」，但內心始終存有芥蒂，而導致二人離婚。

《男》書的情節與大衛連的電影「雷恩的女兒」的故事有一部份很類似。二者都是男女婚後因為丈夫性能力的缺憾，而有紅杏出牆與種種的悲歡離合。然而二者卻分別發生在截然不同的時空環境，「雷恩的女兒」發生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愛爾蘭；《男》書的故事則在文革前的中國大陸。二者的故事結構雖相近，但卻傳達出很不相同的訊息。「雷」片反映的是天主教社會中對性的態度，認為婚姻之內的性活動是造物者為繁衍下一代所設計的，是一種神聖的行爲，然而追求性的愉悅卻是嚴重的罪惡；但另一方面人們卻又覺得完美的性結合是人類感受到真實存在的重要途徑，因此西方社會中性的問題主要來自源於宗教的社會壓力與內心強烈欲求之間的衝突。

《男》書所反映的問題與宗教無關，它所關心的是「人們都渴望愛情，但是為什麼在經歷了文革的中國大陸，愛情被各種政治、社會因素磨損得只剩動物性的生理需求？」，書中對之深感憂傷：

純潔的如白色百合似的愛情，戰戰怯怯的初戀，玫瑰色的晚霞映紅的小臉，還有那輕盈的、飄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法國式羅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圖式的愛情理想主義，全然被黑衣、排隊、出工、報數、點名、苦戰、大幹磨損殆盡，所剩下來的，只是動



書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作者：張賢亮  
出版：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八八年

物的生理性需求。可怕的不是周圍沒有可愛的女人，而是自身的感情中壓根兒沒有愛情這根弦，於是，對異性的愛只專注於異性的肉體，愛情還原為本能。

在這一段話中作者點出了性與政治這兩個密切相關的主題。

從性這一方面來看，書中顯示中國大陸的人們在思想上要求道德的純淨，男女為革命而結合（並將娼妓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惡習）；另一方面社會中大多數人們卻無法享受以愛情為基礎的性生活，結果生理性的衝動成為生活中重要的動力，這種「非理性的本能，渴求一個活生生的，實實在在的肉體結合，不管她是誰，只要是我親眼看到並刺激起我情慾的異性。」書中反覆地提到這一點：

十年來「大批判」的發展剝去了人的一切發展，頂峰也就是出發點，於是我們最終還原為生理學意義上的男人與女人，返回到猿剛變成成人的一瞬間。  
這裡的愛情呢？有愛情嗎？去他媽的吧，愛情被需求代替了！

書中也談到從北京來的女知青何麗芳私下從事賣淫工作，在「北京」與「知青」二個名詞的陪襯下，這個例子顯示出強烈的諷刺意味。此外男女主角的結婚也是如此，婚前二人並無愛情可言，對章來說，最吸引他的還是「那赤裸裸的、柔軟而又生氣勃勃的肉體」或說「立體感與肉質感」，所以談婚姻時「純粹就像是在談買賣」。然而想像總是比較美麗，一旦面對現實時，現實反而變得像虛幻的夢境那樣無法掌握。婚前最吸引二人的情慾，婚後卻成為內心最大的負擔。而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中卻又不提供疏解的管道，當他們發現性生活不能協調時，黃建議她的丈夫去醫院治這種病，二人在黑暗中無奈地對話：

「現在醫院哪有看這種病的？只有人工流產、結紮……」

「到大醫院去。」她的聲音好像離我很遠。「要不，找走江湖的郎中。」

「笑話！」我像是自言自語的說，「到大醫院要證明，別說幹部不給我開這樣的證明，就是開了，醫院一看我這樣的身份，又是這種病，連號都不會讓我掛。江湖郎中？現在哪兒有江湖郎中？早讓人家當「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

作者同時又從性的苦悶反省到政治問題，因為一個「沒有愛情，只有欲求」的社會和一個只有人工流產、結紮，沒有治療功能障礙疾病的社會，是中共幾十年來發動各種革命的結果。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涉及中共的意識形態與政權維繫等。從思想層面來說，中共意識形態認為各種心理疾病的產生是由於革命思想不夠堅定所致，所以治療的方式是思想教育（例如讀《毛語錄》或馬克思的作品來從事思想改造）。對於男子陽痿、早洩等症，他們也持相同的看法，在一九八二年上海出版的一本《家庭醫學全書》中，提到治療男子性功能障礙的方法：

陽痿、早洩、遺精的防治，主要在於端正思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解除顧慮，克服一切不良習慣，正確對待性生活。

然而讀馬克思真的能解決「賽克思」(sex)的問題嗎？作者在書中藉著男主角和馬克思之幽靈的對話，對之質疑，書中馬克思說：

孩子我聽到了你心理的呼喚……但恐怕在這方面我不能對你有所幫助。

這句話表面上看來平淡無奇，讀來卻讓人覺得深具諷刺的意味，諷刺那個將革命思想當成萬靈丹的大陸社會。

另一方面作者又藉著性無能的比喻諷刺大陸的知識分子，說有些知識分子是在心理上受了政治的閹割，終身任人驅使，無所作為；有些知識分子則是「沒有被人騙淨，能力喪失了，慾望卻還存在，最後被它自身的慾望折磨得發瘋」；所以國家才被搞成這般模樣。整個社會都在玩語言的遊戲，上面的人在愚民，下面的人在愚君，因此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作個安份守己的人，躲在人群之中，把知識和思想隱蔽起來。然而這不正是作者所諷刺的被關掉的知識分子嗎？書中藉著大青馬的嘴，沉痛地說：

唉！我甚至懷疑你們整個的知識界都被關掉了，至少是被發達的語言敗壞了。如果你們當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真正的鬚眉男子，你們的國家也不會搞成這般模樣。

書中章永璘結婚前的一位室友周瑞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國民黨某軍事學院的畢業生，舊學底子很厚。年輕時非常活潑，玩樂器、打籃球，還跳交際舞，從忠誠坦白運動開始到文革，他寫了五百多份的檢舉材料，結果：

每寫一份檢舉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爲了救自己，使自己能過個平平安安的日子，卻把人生最寶貴的東西丟掉了，最後成了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

他所寫的告密信先是交給領導，後來又交給造反派，在檢舉、揭發之中，他被送入牢中。在牢裡又拚命寫申訴信爲自己辯護，可是從來不管用。他認爲「不是不管用……是上面沒有見到。準是讓甚麼人在中間卡了。」張賢亮卻藉著章永璘的角色很清楚地說明，根本的原因的「被他『提供』過『歷史材料』的原國民黨人員，這時不知是誰平了反，又在農墾系統中恢復了職務，於是『在中間卡了』他的申訴書。」

周瑞成是一個典型的被政治關割了的知識分子，書中描寫的埋頭寫申訴信的情景在大陸上顯然也是十分常見的事。然而其中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亦即在那些寫申訴信的人們心中，要爲他們的苦難負責的不是「上面」的領導階層，而是卡在中間的小人，在意識中他們仍然相信，只要上面賢明的領導看到他們的申訴，他們立刻可以洗刷冤屈，獲得平反；這樣的希望是支持他們活下去，並使他們有勇氣繼續寫申訴信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從書中我們可以發現，要爲人民之苦難負責的不是卡在中間的小人，也不單純是上面的領導，而是整個體制，包括被關割的知識分子與活在政治神話之下的順民。

〈男〉書在中國大陸的盛行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作者在書中點破了許多的神話，值

得深思，他更表明了人們希望不要活在一個只有需求而沒有愛情的世界，不要活在一人連「掏一回廁所也要說成是學了毛××著作的結果……」的世界。因為「在政治口號的表層下，在過著最普通生活的最平凡的人的心中，有一種不能被政治征服的、想過好日子、可怕的利己慾望。這種慾望像鬼似地藏在每一顆心的死角，不管甚麼政治運動都沖擊不到它。相反地，它還會叫人冷不防地鑽出來，把政治給人的影響化為烏有」。我想這些話正是大陸人民的心聲，這一點點的想過好日子、利己慾望，或許是未來中國大陸共產體制發生變化的一個原動力。這個問題涉及人類生活中「公」與「私」（或說「群體」與「自我」）二個領域之相互關係。在中共政權之下，長期地將「公」的要求推展到極致，因此在大公無私的「革命理想」之下，一切私人領域的事情都不重要，它們只有在為革命服務時才有意義。然而這種理想可能實現嗎？當革命熱情退卻之後，或者當革命神話不再為人們接受之後，中共政權必須妥當安排人民的利己私慾。張賢亮的小說強烈地反映了人們這種內心的渴望。然而吊詭的是利己慾望的發展可能走向尊重人性的理想社會，也可能成為人慾橫流的悲慘世界。像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慾望像具有動力的火車，而經由觀念、理想所形成的世界圖像則是鐵路的轉轍員，這列火車將駛向哪一個方向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無疑地這個問題是當代大陸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

### 更正

- 〈當代〉第二十六期錢新祖〈公案、紫藤與非理性〉一文，打字排版錯誤更正如下：
- 十三頁第四行(Dipankara)應作(Dipankara)。
  - 十六頁倒數第五行「瀉山靈佑」應作「瀉山靈佑」。
  - 二十一頁第三行〈楞伽經〉應作〈楞伽經〉。
  - 二十四頁第三段內，所有「洞山」均應作為「瀉山」。最後一行「東山水山行」應作「東山水上行」。
  - 二十五頁第一行「幅」字應為「壩」。
  - 二十六頁倒數第四行(Foreward)應是(Foreword)。

〈當代〉第二十六期袁鶴翔著〈人——哈姆雷特的問題〉文末(註二)中，享樂主義及禁慾主義所附英文誤植，應為：享樂主義(Epicureanism)和禁慾主義(Stoicism)。